

# 共同购买二十年 香港社区支持农业小史

※ 郑依依

本文根据林志光、杨宝熙和陈惠芳  
三人一次深谈，加上资料搜集写成。  
作者郑依依为民间组织工作者。

在香港这个石屎丛林里，在这个连提供人类粮食的农业都像是没落行业的城市，社区支持农业（CSA）自始至终，似乎是一段在金融或地产的浊浪滚滚潮流底下，一股微微翻动的暗涌。

## 廿年起起伏伏：CSA细说从头

寻溯香港CSA历史，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是朱佩坤（人称阿Pad）的丰之谷。1989年，香港发生毒菜事件，其后香港人开始关注食品健康，亦从而留意环保与农耕的相关议题。自美国修读艺术设计回港的朱佩坤，1995年与农夫林镇盛合作开办丰之谷，因著个人对健康食物的追求经营农场，并开始在市场蓬勃发展的香港，以一种带著挑战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的CSA方式，营销农作物——虽然，当时CSA这个概念可能甚至尚未为香港人所知。

杨宝熙与朱佩坤是同代人，也在差不多时候开始关注农业和永续生活，她们一起组织香港有机农业协会。宝熙回忆：“丰之谷最初开始时，已经采用Box System（装箱卖出），顾客预订了菜后，便根据那个星期收成的菜的数量，全放在一个盒子里送出，不能挑选。当时连‘社区支持农业’这个名词也未流行，只一味以‘订菜、订菜’称呼。”



Box System是热爱美食的朱佩坤从美国学回来的方法。尽管她没有将之称为CSA，甚至，可能这对她来说并不很重要，从她的角度而言，或只是想吃健康的菜，销售的对象也针对比较关心健康、新鲜菜的消费者而已。菜价订得比较贵，与后来名正言顺打着CSA旗帜、明确地想支持某些农夫的理念不太一样。可是，朱佩坤的形式是CSA，她曾经在2003年一篇媒体访问中提及消费者三种参与其中的方法：例如一伙人一起做农夫，另外找想吃的人来买；或者农夫自耕自吃；或消费者不下田，只是集资供养农夫和农场，然后大家分享农作物。总之，不同方式也可以投入生产有机菜的不同环节之中。初期，有机菜价格昂贵，朱佩坤在那篇访问中如此说到CSA的好处：“就是想更多人可以吃到有机菜，我们才搞这个新概念，例如，现在有些家庭是吃不起有机菜的，但透过CSA协议，你可以用劳力换取蔬菜。又因为共同购买没中间人，农夫便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所以，现时超市一斤有机菜，去到20几至40蚊<sup>①</sup>一斤，到时，可以10元以下便吃得到。”<sup>②</sup>

甫开始，丰之谷为香港的CSA炮制了一个关于有机蔬菜的美味开端。而真正扛著CSA旗帜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则是1994年冯冰罗在南丫岛开设的有机农场。冰罗九十年代在绿田园基金接触有机耕种，其后爱上南丫岛宁静开放的气氛，1994年跟两名拍档在岛上开办Green Cottage Farm，打开香港CSA的序幕。

## 从量变到质变： 2000年前后的分水岭

### 金融风暴造就返农契机

97年金融风暴后，香港进入经济低迷期间，农业这古老行业，重新被当成一种社会经济出路而提起。

“当时很多三行<sup>③</sup>、建筑的师傅，因为行业低迷，而他们又不想领综援<sup>④</sup>，便问政府会否有土地可以开农场，他们自己懂得搭棚、拉水喉、开田。”一直致力推动香港本土可持续生活，曾经在嘉道理农场<sup>⑤</sup>工作的林志光回想当年：“这刺激了政府，原来香港还有新人有兴趣耕田的。”

直至2000年，政府渔护署推出“有机转型计划”，协助一直使用化肥农药的农夫转营有机耕种。而且当时确有一批外行人去开农场，也间接刺激政府思考香港的出路，支援农夫转型，推出措施和政策鼓励有机耕种，为之后几年的共同购买发展铺路。

## CSA新内涵： 强调生活和人与社区关系

志光认为2000至2003年这段时间就像个分水岭。有机耕种不但从量上有所增长，也带来CSA质的改变：扭转了内涵，加入了人与社区关系的元素。“此之前的参与者，比较倾向关心环境、或经营农场，他们的特性是很看重如何经营好有机农场，前期的角色是如何成功地种出有机菜，而不是太著重社区连结。”早期，香港有机耕种的讨论很长时间停留在食品安全、环境教育层面。但2000年以后的阶段，参与者理念开始深化，重新聚了人气的农业，除了生出有机这门如今为大众关注的耕种方向，更酿出CSA这株至今仍然是小众的奇葩，其后由一些包括社福机构和劳工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NGO）借著申请政府基金，在07、08年间更有一阵子的蓬勃小阳春。

2003年的非典疫症（SARS）之后，政府开始构想如何振兴本土经济，推出可持续发展基金。由于政府2000年已推出有机农业计划，至04、05年，有些农夫已经耕种几年，因此市场上有机菜多了，有机农夫也多了，这些

客观因素存在，一些民间组织发现能够以食物为媒介，通过共同购买的形式，申请资金；也打著本土经济的名义，进行共同购买，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论述亦开始扩充至社区的建立、社会制度等人文关系。例如由屯门仁爱堂于2002年成立的草根妇女团体绿色女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绿色女流成员来自社区的基层家庭，这些妇女每天为日常生活大小事务忙碌：买菜、煮饭、清洁。既要确保市场上食物是否健康，又要懂得烹调，还要让家人吃得饱吃得好，警惕清洁剂是否安全等等，事事在心。为了让妇女们买到便宜的本地有机蔬菜，并体会农耕的苦与乐，她们成立了“有机农妇组”，既下田也进行共同购买，后来甚至在大厦中堆肥，以及开展收集区内食肆废油做环保肥皂等小组。

绿色女流从个人和家庭开始，搭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助互利的关系，视野更扩阔到整个屯门区的发展、香港农业和生态等问题。这个由农活搭建的平台，也促成个人和小组的成长。例如草创阶段已经参与的成员陆少琼，就一直积极参与跟区内以至香港整体环保运动。绿色女流数年后解散，陆少琼跟另外一些姊妹组成绿慧公社，继续生产废油肥皂，并在全港各地参与和举办环保教育活动。

## 带著农的视野的发展观

在民间组织以外，另外一个将有机耕种延伸至社区的转折点，是“一些热心人，例如TV（袁易天）<sup>④</sup>，差不多在这段时间在上水的白沙搞农场，他们的社会关怀和背景，也为香港有机农业运动注入更广泛的社会视野。部分人虽然不太善于耕种，但他们很快将农业讨论拉阔了很多。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分水岭上，他们创造了一个条件出来，让更阔层面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志光说。

差不多同时，嘉道理农场亦开始与一些社区组织合作，包括一些住宅区的居民组织和学校等等，进一步向社区推出去，深化再扎根。有些朋友在推动社区农圃；另外，有一个群体讲究“食”，出现了“有机大使”这概念。还有香港有机农业协会的成立，集合有机农夫的力量。这背后，嘉道理农场整体的思考是，只要把工作延伸到社区，就有机会将“农业与生活”结合，有别以前只会谈有机耕种，还会讲“有机生活”。

“有机大使最初是想推广有机，从食物入手。但如果一开始就很理论性的话，对市民大众来说过于深奥。因此一开始就用一个烹饪班，借用社区中心的厨房，例如先搞四课的烹饪班，然后招募有机大使，之后才开始讲理论、环保。”曾经在嘉道理农场工作的宝熙说。



## 有机生活的诞生： 农业与生活相结合

嘉道理农场的有机大使计划，孕育了后来的大埔共同购买小组<sup>⑤</sup>，成为至今仍然坚定地运作的CSA参与者。2003年底，嘉道理农场召开一个正式以CSA为名的“社区为本的有机农业”研讨会<sup>⑥</sup>，很多社会工作者参与，包括大学讲师和社区工作人员，为日后整理CSA的社区脉络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在2000年退下教学前线的大学老师文思慧<sup>⑨</sup>与其伙伴的CSA实践也陆续成形。2000年，文思慧脱离在中文大学的正规教学生涯，开始耕田。三年后，人称“舅夫”的退休农夫加入文思慧的团队，她亦在大埔旧墟开办陈皮村书店，店内供借阅的书种包括农耕、具人文视野的科学著作，以及在地公民运动等书籍，希望读者能在阅读中反思生活意义。文思慧农耕之余亦努力笔耕，写作推广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深刻批判，并在中大教职员间组织共同购买小组土生合作社。

2005年初，文思慧和伙伴在油麻地开设短暂的土生良品店，亦是CSA走进社区实践的重要一步。土生良品店出售每天由大埔林村农场新鲜运到的有机蔬果，包括平日在街市鲜有见到的连根花生和大蕃薯，也有常见的西兰花、南瓜、萝卜、芋头和红菜头。除有机蔬果外，土生良品店还出售没有化学添加剂的柑桔酱、腰果酱、面包、印度尼西亚糕点等制成品。尽管小店只试营一个月，已足够教人念念不忘。

## 谁退场了，谁留下了，谁被记住了

回头看一些曾经办过共同购买的民间组织，高峰时期达10多家，例如沙田杨震青少年中心、民协社会服务中心等等，但几年之后，留下来的并不多；反之，坚持下来的共同购买小组，或即使艰苦经营，或有过昙花一现的美丽时刻，却深深刻入人们的脑海。若说其中“成功”或“失败”，又是为何？

文思慧06年筹办的土生合作社共同购买小组，运作了约一年时光，而宝熙是土生合作社第一批支持者。她认为土生合作社的艰难，在于它只连系个人。即使小组成员充满理念，愿意预先付款、支持农夫，又有开会、入股等等要求，但“会员制是个人的，影响力有限，也死得很快。会员即使付3,000元，甚至8,000元，以至过万，也只是个人而已。”宝熙分析：“我正认为它理念太强，变成框限自己。它一开始即接触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其实自己不煮饭，买回去就丢给母亲。他们或许个人很想支持，但家人倒不一定，甚至觉得很难煮，买回来要摘掉许多叶。另外，土生合作社卖的是五谷食粮，较难销售，而且货品的流转很慢。我买十斤米可能两个月后再买，而不是蔬菜类会天天去买。所以卖什么食物亦决定了土生合作社不能持久。做生意始终还是要看流量。”

至于由民间组织带动的共同购买也多不成功，志光认为跟其出现的社会背景与条件有关。“他们中有些是有理念的，也想做好这事，但当初的切入也许有点机会主义：本身对行业不熟，只是觉得这议题某程度上与自己社区工作有关，便贸然投入，想边做边学，但真正学成功的却

不多。”良好的农场生产与销售的模式未能有效建立，是故民间组织申请的资金完结后不易成功地变成一些较持续的运作。宝熙指提出，绿色女流的结束，与仁爱堂负责计划的主任离职有关，共同购买做不下去，是因为没有了组织者。“但也未必很遗憾，因为培育了不同的人出来，后来在不同岗位上做。”正如上文所述，元老之一的陆少琼如今仍然活跃，全情投入环保肥皂的公社式生产，实践一种民主的合作经济模式。而文思慧的伙伴们到今天仍然协作两个以本地农友为主的共同购买小组，成员预先付半年买菜钱，每星期吃到当季蔬菜。

## 农产品耕耘的社区厚度

至于文思慧当年另一将CSA带入社区的土生良品店，虽只在2005年初农历新年前，以元宵临时档的形式，存在短短一个月，但却教成员如陈惠芳（芳子）不断回味：“开始的时候整个事情是很刺激的，第一是有店，第二是店内有些想象不到咁‘正’<sup>100</sup>的食物，包括用农场产品自制的副产品，例如新年有萝卜糕。这一点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颖的：原来除了通过农产品本身支持一些健康理念外，食品加工还多了一重社区关系，有人物的进入。土生良品虽然很短暂，但有些新的东西出现。”

## CSA的延展： 饮食自主、手心相连、永续明天

宝熙亦补充土生良品店如何帮助传递CSA的理念：“店接触到的是街坊，它成功在于透过街坊散播理念出去，很快。而且来店里的是主妇，她们很支持，结业时甚至很不舍，所以土生良品店虽然这么短，它还是成功的。”稍顿，宝熙继续：“而话说回头，土生合作社因为理念很强，所以提出来的都是一针见血，或者是很根本的问题。当时在一些展览中，土生合作社开宗明义地反对超市，撑小农户。我记得有一句口号是：越洋商品非关绿色生活，克制消费始有永续明天；其他还有：自耕自造，超越超市；饮食自主，身土不二；我煮我吃，心手相连；爱劳动，爱土地，爱健康等。这些当时看似很前卫的说法，都在圈子内外播下种子，成为今天CSA运动很基本的理念。”

近年，亦有农场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例如“八乡人吃八乡菜”之于菜园村的建设在地农耕经济、例如马宝宝社区农场之于马屎埔的农耕生活保育，共同购买衍生出更丰富的社会意涵，甚至深深根植于追求社会公义的理想之中。

## CSA与大社会： 要冲破哪些限制或创造什么条件？

香港CSA跌跌碰碰20年，成功成熟的经验不多，然而，当中几许原因乃“非战之罪”，抑或只是这方水土尚未适合？

也许，从2007年底宝熙一手促成的自在生活为例，可以看到端倪。香港社会目前“客观”的限制逐一浮现——或许，未来的改变，还要竭力开创出有利的条件与土壤？

宝熙说，自在生活自始便吸取了土生合作社个人会员的局限，鼓励民间组织用共同购买的形式与农场合作，“我们送货只送去一个共同购买点，能省很多运输的费用。”然而，自在生活与土生合作社有同一死穴，“就是卖的并非日常产品，平时没有卖菜，只在农夫收成太多，卖不出去时，我们才帮忙卖一些。”明确地要支持小农的自在生活，不论卖米或蔬菜，很强调直接去到农村，认识生产的农夫有名有姓，即使加工食品也一样，甚至最好是在本地制作，“可豆腐这种可以卖较高价钱的产品，又不能只买几砖豆腐就驾车去送。”宝熙说，营运成本仍然高昂。

制作副食品的另一重限制，在于严格的食品条例。“我记得有次想请爱华<sup>10</sup>造鸡屎藤茶果，但碍于食品条例的限制，当时不敢大肆宣传，因为我们没有牌照，也未至于想要用这事来做公民抗命，‘就随你来控告我吧！’只是很小圈子内有朋友来买，还要很勉强地让爱华亏点车费。”在扩阔本土经济的可能性上，自在生活有所讨论，还没及实行，直至由后来圣雅各福群会的土作坊<sup>12</sup>著手跟进。

芳子很欣赏CSA从耕种到副食品生产的转变，因为这向食品多元化又迈进一步：“圣雅各其实也是后期才有食物加工队，最初也只是协助会员买卖制成食品。当年土生良品店制造什么辣椒酱，令人很高兴，我们可以从种植之后，进入食品加工，慢慢建立起在地性和紧密性，那个社区又会多了所谓社区经济<sup>13</sup>的层面，丰富共同购买，发现和重整社区资源，看看社区中人的能力，结合食物生产的可能性和机会。一般来说，人们70%的食物来自加工食物，蔬菜农夫与消费者之间的结连有限。并非每个人也想做农夫的啊，但多了一些人可以进入这个经济和劳动交换的层面，会很有趣，使CSA的发展又多了厚度。而且有名有姓，我们开始去了解食物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芳子说。



香港的食品条例固然严格，此外，要发展CSA，生产者、消费者以至社会制度都需要改变，作为一场运动，就应该深入分析社会，又或不得不探索新的社会可能。芳子提出法律条件以外的困难：“生产都远离香港，令我们很难搞消费者运动。香港政府的政策快速地将农业杀死，六十年代我们还有米、不少蔬菜，但很快农田缺水、土地价格上升，令香港没有了生产者，于是很难去推消费者运动。台湾有很清楚的生产者，很容易建立起关系。而且香港太方便了，我为什么要共同购买？而且又不能选择。”

共同购买作为社区支持农业的一种现存模式，也许目前仍有局限；但整合调动社区的资源，使食物生产变得多元，可能正是我们要创造条件、冲破限制的方向。

- ① 粤语“货币”的称谓，即港元。
- ② 〈香港有机革命最前线〉，《明报周刊》，2003。
- ③ 指从事泥水、木工和油漆三个行业的工人。
- ④ 全名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是香港社会福利中的一项入息补助，作为经济上无办法自给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会福利安全网。
- ⑤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 ⑥ TV从2000年开始积极推动生态农耕，是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会员。协会曾经在香港与大陆边界沙头角的南涌进行耕种，后推动养地运动，希望保留乡郊农地和生态，平衡主流社会以地产发展为主的狂飙，质疑这种一面倒以城市资本

- 和市场为终极追求的发展观。几年前，协会在新界北粉岭的马屎埔跟当地农户成立马宝宝农场，推动可持续农耕社区。至2013年冬，马宝宝农场的有机市集，已经是周边大厦和其他香港市民购买有机菜，以及经常探访的农耕社区。
- ⑦ 详见本文集香港篇文章：〈大城小事——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
  - ⑧ 详见《三斤半菜开始》一书的附录，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作者江琼珠。
  - ⑨ 文思慧老师于2013年12月17日安然离世。她的挚友分享2008年初思慧写的题为“古道西风瘦马”的文字。在此，我们也记下。怀缅。共勉。  
“希望变身一头马，瘦也好不瘦也好，呆

立于古道边吃西风，西北风也好。怀念那冻、那幌荡的风景、那通往远方而有很多前人踩得亮晶晶的石头狭路，路狭相逢或不相逢，都知道大家曾经走过，也希望后来者一直可以走下去，有时仰望著星河——天上更亘古的道路，很多光照应著，便不怕夕阳西下，也可安慰断肠人了。词写至尾，瘦马早已融入西风古道，不用刻意多提。”

- ⑩ 广东俗语，意谓“好”。
- ⑪ 爱华是屯门区一位全职家庭主妇，曾经是绿色女流成员，以一手好厨艺见称。
- ⑫ 详见本文集香港篇文章：〈城市接连农业〉。
- ⑬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